

“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专栏

主持人语

文学关系研究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的一个传统研究领域，已取得极其丰硕的研究成果。如何进一步拓展其学术空间，挖掘该研究领域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值得学界同仁认真思考。文学关系研究者要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建立起各种文学交流问题的历史情境，这是我们对文学交流现象产生理解和推测的一个基本前提。因而推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重要动力之一，是史学革命，重点是史料革命。葛桂录教授近年来致力于文学关系史料学的研究工作，认为跨文化语境中的文学关系史料学研究，作为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的基础学术工程，有助于我们清晰地还原文学交互影响的历史进程，也是建构科学的方法论与良好学术风气的重要保证。关注文学交流史料的历史语境与评判标准，将史料学研究与学术史探讨及理论批评范式相结合，力求创造性地理解运用，发掘文学史料的潜在价值，对揭示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学交流史料特点及其对现实的启迪价值，具有战略意义。葛桂录教授在论文中对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的史料基础、文学关系史料学研究的基本内容及其学科价值等问题作了初步探讨。可以说在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积累中，文献整理和研究不只是学科发展的基础，它本身就是专门性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尹德翔博士多年来潜心研读晚清使臣的日记，并利用在英国访学的机会查考文献资料，在此基础上比较清晰地呈现出晚清使臣涉猎西方文学的历史画卷：郭嵩焘曾与白郎宁谈诗，曾纪泽喜读英诗、喜作“中西合璧诗”及观看莎士比亚戏剧，罗丰禄谙熟英语文学，且为出色的翻译家、演说家，张德彝日记中记载的大量西方戏剧，以及李凤苞、黎庶昌、张荫桓、武廷芳、陈季同等与西方文学关系关联的行行足迹。本论文正是立足于史料的发掘、梳理与阐释，重演了中西文学交流史上那几个富于戏剧性的场面，还原了历史的真面目，表明晚清使臣对西方文学的好奇、学习乃至崇拜都是存在的，进而对钱锺书先生的一个学术观点作了补正。

文学关系研究的推进除了史料搜索整理以呈现丰富的文学交流史图景外，尚体现为独特思考视角所带来的学术魅力。学界关于拜伦与中国关系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面世，顾瑶博士的论文别开生面地从基督教灾难史观切入，较好地呈现出拜伦想象的中国与中国人想象的拜

伦这两者之间的关联与变异。文章紧密结合了拜伦生存的历史语境与拜伦传入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展示了中英拜伦观的不同及其重要原因，立体地凸显了拜伦及在中国命运的思想史意义，历史的质感得以体现，并启发我们探讨拜伦的世界主义与世界的拜伦主义之间的错位关系。

周云龙博士的论文也通过较详细的资料梳理，立足于中西文化交流场域，指出黄佐临在1962年提出的写意的戏剧观与“话剧民族化”的背后纠缠着一个繁复的历史语境，在后者的论述框架中，写意的戏剧观中的“写意”被赋予了民族属性的意义，构成了表述主体自我确认的文化实践策略。而且从根本上看，“写意”戏剧观是西方的现代戏剧文化观念在中国语境中的衍生性命题，它为中国和西方的跨文化互动提供了一个可供分析的场域。类似的个案研究会促使我们重返历史现场，在中外文学关系层面上深度考量与评价某些文学观念背后的文化选择策略，及其所指涉的某种文化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辩证关系。

在中欧文学交流史上，英法作家对中国题材的抒写，往往展示出鲜明的文体意识，其中对话体与书信体就是他们常用的叙写方式。钱林森教授以费讷隆《苏格拉底和孔夫子的对话》为例，展开了中法文学交流史中独特的对话体文本研究的学术空间，从解读文本着手，揭示出了这一对话文体生成发展的特征及其在中法文化（文学）关系史上的思想价值和学术意义。该文指出费讷隆所创作的这些堪称文学上“地狱之旅”的对话体杰作，显然渊源有自，但这位好古、仿古的古典主义名家在集众家之经典于一体的同时，又有自己的独创，表现在他别出心裁地将东方圣哲复活，引来与西方古哲对谈，写出这样一篇苏格拉底和孔夫子的对话文字，从而将“古人对话”这一文体的视阈与潜力发挥到极致，更将这一对话文体的书写和应用推进到一个极致，进而迅捷达到了他利用中国题材的目的，开启了西方“哲人”负面看中国的先河。

这种妖魔化中国的负面形象在19世纪以后渐成西方看中国的主流，“盲目排外”、“不可理喻”、“野蛮”、“残忍”等词汇变成描写中国与中国人的套话。有识之士如英国历史学家迪金逊等，却逆西方如此潮流而动，假借所谓长期旅居英国的华人“约翰中国佬”之口，对当时倍受质疑的中国文明发出了极为罕见的不同声音。叶向阳教授的论文就在全面考察迪金逊创作于20世纪初的《约翰中国佬信札》及作者的其他与中国相关的论著、书信的基础上，指出迪金逊通过这部书信体的中国题材著述，在讥讽批判西方文明（尤其是近现代以来的大规模工业化）的同时，还带有较强烈的为中国辩护的意图，展现了他对中国文化全面的好感，并引以为人类生活与社会体制的理想状态。该文对发端于欧洲17世纪、繁荣于18世纪的所谓

“东方信札”体裁作品在形式及内容方面的特色，以及与其所承载中国主题的密切关系，作了较详尽的分析探讨。

总之，本期中外文学关系专栏刊载的这几篇文章，建基于资料梳理及分析阐发，提出了可供进一步研讨的学术话题。应该说真正具有知识积累意义上的创造性成果，必然依赖于对文献史料的详尽把握，对学界前辈及时贤成果的熟识消化，在长期独立的文献考索和研究中，以及在对历史文化语境与现实人文关怀的持续考量中发现问题，最终才能出现有深度的、专业性强的研究成果。我们也希望经过学界同仁的协同攻坚，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领域产生出更多的富有学术积累意义的优秀成果。